

Jun. 6
2024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4年第3期（总第33期）

全球治理中的 安全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杨嘉豪 张尊月 蔡皓宇
孟思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专题序言

安全化既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本期《全球治理学科动态》以“全球化中的安全化”为主题，回顾了安全化理论的历史与发展，分析了美国借安全化策略合法化芯片出口管制的手段，展现了欧盟在数字领域的安全化考量，并引入“去安全化”视角考察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对本体性安全的重构。这些近期文献揭示了安全化在不同领域的多维度表现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表明安全化对经贸、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需警惕“泛安全化”风险，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本期目录

1. Stephane J. Baele and Diana Jalea, “Twenty-five Year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A Corpus-based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2, 2023.
2. Hai Yang, “Securitization, Frame 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forthcoming.
3. Daniel Mügge,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EU’s Digital Tech Regul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0, No. 7, 2023.
4. Adrian Pop, Ioan-David Onel, “(De)securitization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Case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1, 2023.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 1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Stephane J. Baele and Diana Jalea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2, 2023.

“Twenty-five Year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A Corpus-based Review”**《安全化理论二十五年：基于语料库的回顾》**

自 25 年前首次提出以来，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 ST）已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安全化理论的奠基性文本包括 Wæver 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章节（1995）和 Buzan 等人的《新安全论》（1998）。尽管安全化理论在国际关系（IR）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成就和缺陷也逐渐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在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等方面。近期，更是有学者对该理论的种族主义基础提出指控，这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在这一不稳定的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 1995 年以来（截止 2020 年）在 15 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 171 篇安全化论文，识别出安全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两大主要失衡：理论发展丰富但实证工作不足，以及理论未能全球普及而显示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本文旨在通过揭示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提供清晰且可操作的观察，帮助学者们重新组织当前的辩论和争议。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 1995 至 2020 年期间在 15 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 171 篇安全化研究文章。这些期刊的选择基于几方面的考虑：



- 1) 核心列表包括了 Wæver (1998)¹ 研究中的 8 种期刊，以便在相同基础上继续讨论；
- 2) 扩展列表包含了所有政治科学协会或组织中明确面向国际关系的期刊，以及所有在 SJR (SCImago Journal Rank) 排名中位列“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类别前 20 的期刊。
- 3) 额外增加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该期刊的长期存在及其最近关于安全化理论的专题讨论，使其也被纳入研究对象。

据统计，总共纳入了 171 篇文章，这代表了过去 25 年安全化理论的主要发展。

通过对 171 篇文章进行编码分类，文章发现了安全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失衡问题：

第一，理论高于方法，即理论发展与实证工作的失衡。首先，安全化理论在理论发展方面迅速且多样，但实证工作的努力却相对不足，在 171 篇文章中，超过一半（89 篇）主要是理论性的，只有 10 篇主要是实证性的，其余文章则在理论和实证上保持相对平衡。大部分安全化研究仍然是抽象的，只有少量文章具有明确的实证问题。这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领域内，特别是批判性国际关系研究中，对高层次理论的重视和对方法学的相对忽视。其次，方法是安全化理论研究的弱点，对理论的偏好伴随着对方法论的忽视，在 82 篇具有实证内容的论文中，仅有 48 篇采用了明确可识别的分析方法，且其中只有 13 篇文章全面解释和证明了所选方法的参数。

第二，欧洲高于其他国家，即安全化理论存在地理分布的失衡。首先，文章的分布严重偏向于选定的少数期刊，171 篇文章中有 71 篇发表于《安全对话》

¹ 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687-727.

(*Security Dialogue*), 期刊编委会主办机构的位置具有重要影响, 欧洲大学更加偏好安全化理论的文章; 其次, 文章的作者所在地区和国家具有鲜明的特征, 学者所属机构位于欧洲的占据了所有机构的 76%, 其中英国更是安全化理论研究的中心, 而来自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几乎缺席, 这反映了当前安全化理论仍坚定地扎更于欧洲学术界。

安全化理论在其 25 年的发展过程中,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 但也面临着显著的失衡问题。本文通过对 171 篇安全化研究文章的系统回顾, 揭示了理论与实证的失衡以及地理分布的失衡。这些失衡问题不仅反映了理论发展的不足, 也揭示了地理分布和学术定位上的局限。本文建议, 未来的安全化理论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证工作的开展, 并努力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应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本文为学者们提供了清晰且可操作的观察, 为安全化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确保“安全化研究的未来”。

编译: 杨嘉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THE
PACIFIC REVIEW**Hai Yang***The Pacific Review***Forthcoming.****“Securitization, Frame 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安全化、框架整合与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合法化》**

2022 年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出台了针对中国的广泛芯片出口管制，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设计先进芯片的软件、芯片制造设备、制造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零部件，以及自主研发和生产先进芯片的技术。本文探讨了拜登政府通过框架整合的安全化方式合法化其新规的路径。

作者以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美国与出口管制相关的官方文件（主要来源美国白宫、商务部和国际清算银行）为基础，以“出口管制”、“半导体”和“芯片”为关键词构建语料库，对美国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视为安全威胁的主张进行定性分析。

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被广泛用于研究精心构建的语言表述如何塑造和组织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核心前提是“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并被理解为对多种价值观或考虑因素具有影响”。框架（frame）就是选择并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或治疗建议”。

合法化芯片控制的关键在于构建威胁、整合框架。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是将行为体的解释框架与其受众的解释框架相联系的过程。本文选取了框架放大、



框架桥接和框架延伸三个过程用以分析技术如何改变和放大三个所谓“中国威胁论”涉及的主要维度（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感。美国官员通过框架整合寻求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的渠道安全化。

框架放大（**frame amplification**）指将现有框架理想化、清晰化或活跃化的做法，体现于美国高度重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其技术领先地位和中美技术竞争。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先进芯片技术等战略技术的领先地位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明显减弱经济考虑和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并坚称新的限制措施不是为了遏制经济，而只是为了国家安全。

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涉及将“两个或多个意识形态一致但结构上没有联系的框架”连接起来，体现于美国官员寻求将芯片出口管制的理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突出向中国提供先进芯片与中国开发先进军事系统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为出口管制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美国还将减缓技术进步与应对人权等问题相联系，进一步模糊了基于价值的外交政策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

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指框架行动者的利益和框架“超越其主要利益，将目标受众认为重要的问题和关切纳入其中”，主要涉及美国的盟友及其国内私营部门。为争取美国盟友的支持，美国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吹捧为共同事业，强调美国与盟国需在应对中国运用先进芯片增强军事能力和加速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威胁方面保持一致，从而将国家安全问题转变为集体安全问题。对于私营部门，美国政府强调始终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同时尽量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干扰。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经验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针对新规产生的持续争议，对以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为中心的合法化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是从概念角度，本文通过一种新颖的分析视角——框架整合，论证了威胁是如何战略性构建和传达的，揭示了合法化和安全化过程的基本模式和动态。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3



Daniel Mügg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0, No. 7, 2023.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EU’s Digital Tech Regulation”

《欧盟数字技术监管的安全化》

文章主要以描述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监管的安全化、欧盟人工智能监管及其潜在影响。

监管（Regulation）是克鲁克和韦斯（Kruck and Weiss）所称的“监管安全国家”（Regulatory Security State, RSS）的重要工具。安全保障需要通过公平规则来塑造科技公司的行为，而不是直接依赖国家权力——这是国家权力让渡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言，这种动态也产生了反作用：数字技术的安全化将安全供给——一种传统的国家职能——施加于当前以商业动机为导向的监管领域。这导致了不仅在安全层面存在更多的监管，在监管层面也增加了更多的安全。这一态势对欧盟的全球监管纠纷造成了挑战。作者利用欧盟刚推出的人工智能监管举例说明这一争论：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前景如此重要，以至于是否也应从上述视角进行监管？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是否应当盖过欧盟自行制定其人工智能治理路径的目标？这一争论仍悬而未决。但鉴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结果势必将在整个社会引发反响。

作者首先对监管、数字技术、安全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文献梳理，提出两个主要问题：首先，RSS 的兴起源自于公共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监管手段，因为它们依赖于私人专业知识，导致监管进入了之前“积极安全国家”



(Positive Security State)¹所管辖的领域；其次，安全化不仅改变了国内的监管政治，也改变了全球的监管政治。在国内，对安全的关注可能会压倒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动机，包括竞争力、产品安全、环境管理等，国际上亦如此。数字技术最初被视为无国界的全球化典范，但现在已成为各国在面对国内外对手时考虑国家实力和脆弱性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认为积极安全国家与监管安全国家并非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欧盟和各国都能够且确实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模式。文章中选取的案例研究是欧盟对人工智能的新兴监管。

其次，作者论述了技术监管的安全化，即安全从两个方面渗透了数字技术的监管：

- 1) 将数字技术纳入安全实践，从而主动将监管作为一种安全工具；
- 2) 针对数字技术的脆弱性，通过监管的安全化来解决感知到的不安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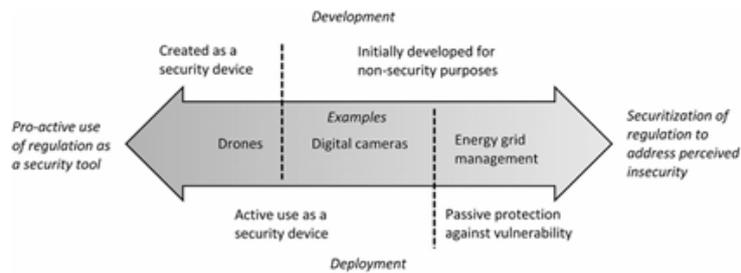


Figure 1. Intersec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示意图一端是专门作为安全设备开发的技术——如携带武器或进行侦查的无人机，还有一些技术并非为安全目的创造但可用于安全领域，如数码相机等。

¹ 在这里“监管安全国家”（Regulatory Security State）不是对“积极安全国家”（Positive Security State）的替代，而是作为一种安全治理模式而存在。监管安全国家是指以监管（Regulation）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积极安全国家则以国家能力作为手段治理，也就是传统意义的国家治理。

另一端是数字技术带来的脆弱性，尤其是破坏重要数字基础设施的可能性。

文章对 RSS 的主导框架强调了示意图的左侧部分：监管被用来促进安全技术的发展、部署与传播。然而，对 RSS 的兴起同样重要的是图中的中间部分和右边部分：政府对技术进行监管，以共同利用其非国家运作，并将其用于安全政策。图中部和右部的动态是安全化形式。作者有意识地在松散的含义上使用“安全化”，而不是像其他学者试图更明确地定义和阐明“安全化”。在此，安全化指的是参考对象被理解为安全相关对象并可能受到安全管理的程度，因此它被视为安全漏洞、安全威胁或加强安全的工具。安全化的后果一方面导致了重新确立公众对监管的单方面控制，从而降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监管一体化的意愿，如促进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安全化也可能意味着公共权威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地追求多边协定，因为它们担心否则会出现类似军备竞赛的态势。

再次，作者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论述了欧盟新兴的人工智能监管、有关安全化的争论及其后果以及安全化下的监管相互依存（regulatory interdependence）。人工智能发展到当前阶段是一种有争议的社会建构，而非一个未经明确划分的领域，它模糊了数字技术的其他层面，包括物质层面（如数据传输基础设施、计算机、数据中心）和数字层面（如算法、机器学习、大数据等）。当前人工智能监管的困境在于：人工智能应用范围广泛，既有民用也有军用，如面部识别与战场无人机识别。因此，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人工智能专家对于从安全角度看待新兴的人工智能监管程度存在不同看法。

从本质上讲，国际监管政治就是管理监管的相互依存性，即其他管辖区域规则对国内的影响。传统上，人们从经济视角看待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一致的规则有利于跨境贸易，不一致的规则阻碍系统的交互；宽松的规则可转化为竞争优势，



繁琐的规则可转化为贸易壁垒和监管保护主义。而从安全视角看待监管，这种态势就会发生变化，国际监管政策受到相对收益逻辑的影响，使得技术和知识的共享更为勉强，从而阻碍整体创新。在国际背景下，安全化的影响波及甚远。欧盟一直将自身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定性为“以人为本”，不同于美国的自由放任态度。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由安全激发的欧盟—美国的人工智能联盟意味着深远的跨大西洋监管合作，以创建一个一体化的监管空间，并联合人工智能力量。与此同时，这一关系会反对全球监管合作，因为这将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无差别跨境流动。

当前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刚刚起步，不同参与者都在努力界定安全因素应如何以及何时优先于个人隐私、自主权等价值观，以及地缘政治联盟（即跨大西洋联盟）是否应压倒欧盟将其定位为中美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替代者的抱负。欧盟人工智能监管的案例表明，安全化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这一领域的监管安全国家模式的范围并非由技术发展的外生性因素决定，而是政治和话语斗争以及特定领域全球化背景的产物。科技领域日趋安全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安全领域本身，这使得一种非敌即友的怀疑心态取代了出于经济动机的监管动机。当前趋势将数字技术与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领域选择性监管合作不再是有效管理全球化的工具，而是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支柱。对于高度重视监管的欧盟来说，更有理由关注监管安全国家模式的崛起及其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

编译：蔡皓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4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rian Pop, Ioan-David Onel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1, 2023.

**“(De)securitization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Case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去)安全化与本体性安全：基于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案例考察》**

受巨大政治经济成本以及塔利班政权上台的影响，美国于 2021 年从阿富汗撤军。这一撤离在美国公众和社会中引发了极大的羞耻感和焦虑感，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在本体论上的安全危机。本文探讨了安全化、去安全化与本体性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美国政治精英如何在撤离阿富汗后重构本体性安全。

作者认为，美国采取了一种“控制损害”的策略，通过对塔利班政权的去安全化为核心，履行美国在阿富汗的承诺，并模糊国家建设目标，试图避免承认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然而，由于行动不协调和竞争性叙事的影响，美国的话语及其去安全化努力受到了挑战，从而对美国的本体性安全施加了更大压力。

作者首先在理论上讨论了安全化的逻辑。国家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构成了（去）安全化和本体性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这些叙事如何被外部感知，有助于理解本体性安全的建构。作者指出，焦虑是影响身份稳定性并损害国家本体性安全的关键因素，而塑造本体性安全的重要途径就是对议题的（去）安全化。安全化指将某一问题描述为“对国家生死攸关的威胁”，并利用政治话语获得国内观众的认同。在建构本体性安全前，国家需要利用去安全化调整国内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去安全化旨在通过解构威胁并将其归入“普通公共领域”来恢复本体



性安全。对于深陷冲突的国家来说，安全化过程既包含安全化因素，也包含去安全化因素。为了使去安全化发挥作用，必须安全化其他威胁，以取代那些即将被去安全化的“目标”，从而实现本体性安全。

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定性话语分析和文献分析，基于美国政府及相关行为体关于美军撤离阿富汗的主要叙述，观察了本体性安全危机的反应。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作为世界自由秩序领导国，其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了冲击，美国本体性安全的“微观基础”被动摇。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和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试图将促进民主和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与美国的主体安全相融合。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安全化行为，将恐怖主义树立为文明社会的公敌；在个体层面上，美国政府通过国内规制及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为其安全化行为取得合法性支持，进而重塑其国内本体性安全。

经历 20 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与阿富汗之间的本体性安全关系发生了变化。塔利班再次掌权和美军撤离阿富汗引发了对自由国际主义范式及国际民主活动合法性的质疑。面对新的本体性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恢复安全。拜登 2021 年两次就阿富汗问题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讲话。讲话中拜登通过强调美国的特殊性和特朗普政府的“意外”协定等内容，试图通过“推卸责任”的策略将美国的国际目标从促进民主人权转移到预防恐怖袭击之上，而不再承认此前在对阿富汗国家建设的叙述。在对阿富汗国内建设问题的去安全化基础上，美国政府又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安全化操作，将中俄描述为“重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塑造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进而重塑美国的本体性安全。

此外，作者还从美国社会内部、外部竞争对手（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塔利班）以及盟友（北约、欧盟、英法德）的层面对美国的修辞话语进行了考察。与

2001 年的安全化行为不同，中俄在美国 2021 年的再安全化行为中表现出更多质疑和批评，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态度差异显著。欧盟将阿富汗民主转型的失败视为美国安全化行为的失败产物，而美国政府则强调反恐怖主义行动的成效。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韩 冰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李 冲 韩永辉
宋 锦 田 旭 沈 陈 彭 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张尊月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邢琦璠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